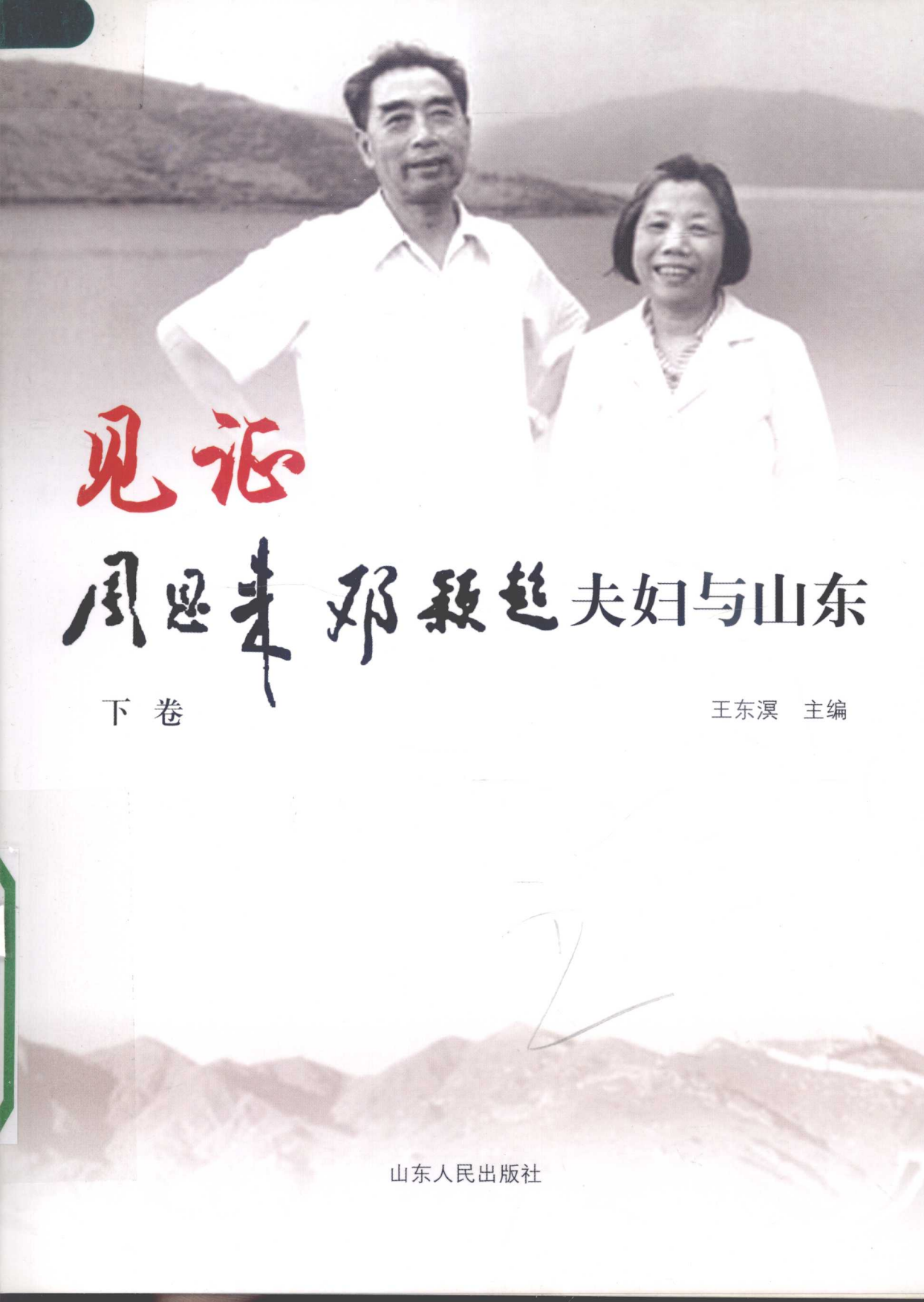




见证

周恩来 邓颖超 夫妇与山东

下 卷

王东溟 主编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K827/881

:2

2008

见证 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与山东

下卷

王东溟 主编

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



C00156578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顾 问 苏毅然 宋清渭

逢先知 高振普

主 编 王东溟

副主编 郭海鹰

艰难岁月



郭隆真与周恩来、 邓颖超并肩战斗的革命岁月

栾曰盛



郭隆真（1894～1931），女，回族，原名郭淑善。河北省大名县金滩镇人。早年入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习。“五四”运动时，参与发起组织天津女界同志会，是天津学生爱国运动领导人之一。后与周恩来等发起组织觉悟社。1920年同周恩来等一起赴法国勤工俭学。1923年经周恩来、尹宽同志介绍，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，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24年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。1925年回国。后在北京主持创办绶云女校，编辑《妇女之友》。1927年曾被捕入狱，经党组织营救于1928年底出狱，在上海见到邓颖超接上组织关系。1929年春，周恩来派她到东北，任中共满洲省委委员、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。1930年任中共青岛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长，中共山东省委妇委书记，同年11月2日在青岛被捕。1931年4月5日在济南英勇就义。



在中央档案馆的一份历史资料中有这样一段话：“山东济南：于1931年4月5日清晨，共枪决英勇坚决的同志22名。他们在党内都担任过重要责任。而且是努力为党工作多年的干部。当他们赴济南纬八路刑场被执行枪决时，不仅慷慨就义，而且以百折不挠的精神，在汽车中高呼口号，光荣牺牲。”在后附的名单中，第十二名是“张李氏，女，37岁，河北泽县人”。这个张李氏，就是杰出的中国妇女运动先驱、曾任中共山东省委妇委书记、著名的济南四五烈士郭隆真。1941年，为悼念郭隆真牺牲10周年，邓颖超写了一篇纪念文章，文中高度赞扬了郭隆真的一生。她在文章中说：“郭林一（在山东工作时的化名）同志壮烈光荣事迹，是如何地令人感动，给后一代留下了光荣的楷模……在‘五四’运动中，在她的一生革命工作中，都证明她是一位坚决勇敢、不顾一切专诚不懈的奋斗者。”

“五四”运动中郭隆真和邓颖超担任演讲队队长

郭隆真，原名郭淑善，曾用名郭林一。1894年4月出生在河北省大名县金滩镇一户回族士绅之家。父亲郭荣桂是个较开明的读书人。郭隆真的启蒙老师是她的父亲。

在新思潮的影响下，全国各地开始兴办新学，1909年，郭隆真独树一帜，在父亲的实际主持下，以郭淑善的名义在金滩镇破天荒地办起一所女学，定名为“元城县（后并入大名县）第一女子小学堂”。讲堂、自习堂都设在郭家院里，一切经费和设备均由郭家自己负担。郭隆真自任义务教员，免费招收了20余名女孩子来读书。她除了教学生学习新课本外，还教唱反封建礼教的歌谣，主动到一些人家去拜访，说服家长允许女孩上学，到校女生逐渐增多。

1912年5月，一位较开明的直隶省学台到元城县视察教育，发现了金滩镇办起的这所女子新学堂，他褒奖郭家父女，并在县里立案，不久又把这所小学搬到元城县里，命名为“红石桥女子高小”。由于办女子学堂有成绩，1913年，郭隆真被选送到天津直隶女子师范上学。

1917年，郭隆真抗婚回到天津后，带头剪了发，将头发剪得和男子一样短。当她走到街上时，竟招来围观。但她泰然处之，觉得自己挣脱了一道封建枷锁，精神上感到轻松愉快。

1919年5月4日，声势浩大的“五四”运动震撼了全中国，激荡着每个热血青年的心。5月5日，郭隆真和天津女师的同学满腔热情地投入到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中。当晚，郭隆真主持召开了各班同学代表会议，她在会上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卖国政府的罪行，并列举了一些国家人民当亡国奴的悲痛教训，郑重地说：国难当头，妇女应当从深渊中跳出来，冲破封建束缚，救国救民。并提出“爱国不分男女，救国不能后人”的口号。

天津女师的学生发动起来了。在郭隆真的倡议下，5月25日，“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”宣告成立，刘清扬为会长，郭隆真、邓颖超担任演讲队队长，进行演讲，张贴标语，检查日货，参加示威游行。郭隆真平时不爱讲话，可是她领着同学们上街演讲时，却滔滔不绝地向群众讲述反帝爱国的道理，使听众十分感动。郭隆真在群众中的影响越来越大，与群众的关系愈来愈密切，同学们都亲切地称她“郭大姐”。

“五四”运动爆发后，亲日反动派恼羞成怒，变本加厉地镇压爱国学生运动。天津反动当局见对爱国学生施行高压手段不灵，就变换手法，诬蔑参加学生运动的回族积极分子是叛教徒，在回民中极力散布“天下教友（回民）是一家”，回汉青年在一起是什么



“回汉混杂”，妄图挑起民族矛盾，分化离间回汉学生的团结，破坏学生爱国运动。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，郭隆真以“女阿訇”的公开身份，进入回族军阀马良盘踞的济南市，秘密进行革命活动。她借居在回民聚居的西关永长街回族领袖朱春熹家中，帮助回教救国后援会长马云亭和其他两位领导人朱春熹、朱春祥等人组织“救国十人团”开展活动。不久，马云亭遭马良杀害。郭隆真回到天津后，动员回族群众集会，公开揭露马良的罪行，并向大家指出：“什么天下教友是一家？为什么身披教友外衣的马良要下毒手杀害回民马云亭？分明是欺骗人民的迷魂药，是挑拨回汉团结的阴谋。”回民们看清了马良卖国贼的丑恶嘴脸，一时众怒难平，在郭隆真等带领下，他们到清真寺砸掉了由回奸马良题字的“其主独一”的匾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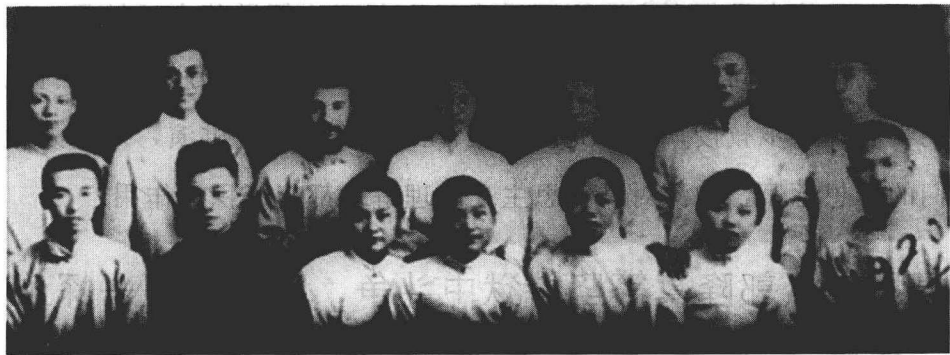
1919年8月23日，郭隆真等10人被推选为天津各界赴北平请愿代表团成员，要求北洋军阀政府总统徐世昌惩办刽子手马良。徐世昌拒不接见，郭隆真等在总统府前高呼“打倒卖国贼”、“还我山东”等口号。经过一天一夜的斗争，反动政府如临大敌，惊恐万状，急忙派军警逮捕了学生代表。郭隆真大声责问警察：“爱国有什么罪？难道只许有人卖国，不许我们爱国吗？”她在被关押期间，不怕威胁，不受利诱，与反动当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，并说：“你今天放我出去，明天我照样进行爱国活动。”

请愿代表被捕引发全国各地强烈抗议。天津各学校学生闻讯后，群情激愤。周恩来等人率领几百人的代表团到北平营救。北平学生联合会等群众组织在李大钊等领导下，积极配合，支持天津代表团的斗争。在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的压力下，反动政府被迫于8月底释放了郭隆真等请愿代表。9月2日，郭隆真等请愿代表和周恩来同志一起乘车回天津。郭隆真和周恩来、郑岩、张若名等坐在

一起，利用短暂的旅途时间，专心致志地交谈“五四”以来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。今后怎么办，是当时大家最关心的问题。郭隆真果敢地提出：“今后的斗争越来越深入，男女同学必须联合起来，‘天津学生联合会’和‘女界爱国同志会’应该更紧密地合作，成为天津爱国运动的核心。”这一主张立即得到大家的赞成。特别是受到当时天津学联负责人周恩来同志的支持。周恩来同志分析了当时的斗争形势，认为有必要成立一个比学联更紧密的团体；同时应出版一个刊物，开展宣传工作。郭隆真等都一致拥护，内心里有说不出的兴奋。

周恩来、邓颖超与郭隆真共创“觉悟社”

9月16日上午，在草厂庵天津学生联合会的办公室里，周恩来、马骏、邓颖超、郭隆真、刘清扬等举行了第一次会议，讨论了新团体的组织机构和出版刊物等问题。由周恩来同志草拟，通过了十项决议。决议规定：该团体本着“革心”、“革新”的精神，以



1919年9月16日，周恩来等在天津成立了觉悟社。该社由天津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组成。周恩来主编的社刊《觉悟》于1920年1月出版。这是觉悟社部分成员的合影。后排右一为周恩来，右五为马骏；前排左三为郭隆真，右二为刘清扬，右三为邓颖超

“自觉”、“自决”为主旨。出版的刊物取名“觉悟”，该团体即称“觉悟社”。《觉悟》的内容：（1）取共同研究的态度，发表一切主张；（2）对于社会一切应用的生活，取评论的态度；（3）介绍名人言论、著作和演讲；（4）灌输世界新思潮。由于大家积极努力，充分准备，“觉悟社”很快即在天津正式成立。郭隆真、邓颖超、刘清扬等都是觉悟社的重要成员，经常在一起议论、研究新思潮，成为“五四”爱国运动在天津的中坚力量。

觉悟社成员不用本名，采用化名，周恩来化名为伍豪，邓颖超化名为逸豪，郭隆真化名为石珊。觉悟社一成立，就请李大钊来指导。1919年9月21日，李大钊同志应邀专程到天津给觉悟社讲演，传播马克思主义。他对郭隆真等敢于打破封建隔阂，男女同学合作，组织起来出版《觉悟》等非常赞许，热情鼓励，并指示他们认真阅读《新青年》、《少年中国》上发表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，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和讨论。李大钊同志还给他们讲了《庶民的胜利》这篇文章，指出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，正是伟大导师列宁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导革命的结果。因此，觉悟社的同志们获得了社会主义的一些知识。另外，钱玄同、刘半农等进步教授，也都先后到天津给觉悟社做过讲演，对启发他们的思想觉悟，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都起了积极作用。

周恩来、郭隆真等坚持狱中斗争，邓颖超等去探监鼓励

爱国学生运动方兴未艾。郭隆真等请愿代表虽被释放，但要求惩办马良的目的并未达到，斗争还要继续进行。觉悟社成立后两天，山东的代表团6人，冲破当地军阀的阻拦，到达天津，找他们联合。



见证周恩来、邓颖超夫妇与山东

天津学生联合会和一些地方学联代表，建议10月1日举行全国性的大请愿。于是，郭隆真再次被选为天津代表之一，与山东代表赴京，会同全国各地代表，一齐到新华门总统府请愿，要求严惩镇压爱国运动的军阀，坚决保护国家主权。总统徐世昌闭门不出。郭隆真抑制不住满腔怒火，不顾个人安危，毅然登上总统府门前的石狮子，历数反动政府卖国和压迫人民的罪行，痛斥徐世昌是卖国贼。军警特务大打出手，郭隆真痛得汗流满面，她一面进行反抗，一面继续揭露反动政府的罪行。在场的群众，非常敬佩她的勇敢，纷纷上前保护她。到晚上10点钟，反动政府制止不了学生的爱国行动，又一次派出大批军警逮捕了郭隆真等32位请愿代表。

由于郭隆真等全体代表的坚决斗争和全国人民的声援，北平反动政府于11月10日被迫释放了全体代表。

郭隆真出狱回天津后，又立即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。11月间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在福州公然屠杀我国学生和军警，制造了“福州惨案”。全国各地爱国团体纷纷对日本使馆提出抗议，同时抵制日货运动也随之更加激烈。12月20日，天津各界在南开广场召开国民大会，焚烧日货。1920年1月23日，学生联合会调查到“魁发成”商号私藏日货不报，便组织学生前往检查。商号老板竟勾引日本人，殴打了检查日货的学生，当场引起纠纷。反动警察厅不但不惩办打人凶手，反而殴打和逮捕请愿学生和各界代表20多人；接着，又查封了学生联合会和各界救国联合会，宣布这些爱国团体“一律解散取消”，使全城陷入白色恐怖之中。

面对敌人的疯狂镇压，周恩来同志和郭隆真、邓颖超等觉悟社成员发动组织群众，和反动政府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。

1月27日，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，觉悟社主持召开了万人参加的国民大会，爱国群众高呼“救亡！爱国！牺牲！猛进！”的口号。

会后，举行了示威游行。觉悟社还决定，于1月29日全市统一行动，举行大规模的请愿游行，包围省公署，提出取消中日军事协定、恢复天津学联等4项条件。根据以往的斗争实践，觉悟社的同志估计到这将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激烈斗争，大家做好了被捕、坐班房的思想准备。

1月29日下午2点，天津各界群众1000多人聚集在直隶省署门前抗议，推举周恩来、郭隆真、于方舟、张若名4人为代表，并启封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各界联合会。省长曹锐被爱国群众吓得心惊胆寒，龟缩在里面不敢出来，双方陷入僵局。

当时，省署大门紧闭，但在门槛下面有个离地一尺多高的空隙。于是，郭隆真等三人随同周恩来同志，一齐从门槛下面挤了进去，要找省长说理。里面的军警早有准备，立即将他们逮捕。反动军警押着他们从省公署大门出来，他们一齐高呼“同胞万岁！”“学生万岁！”请愿群众见4名代表被捕，就不顾一切地冲向省公署大门，痛斥曹锐无理镇压爱国运动，要求立即释放4名代表。反动军警穷凶极恶，举起枪托，拿起皮鞭，向人们身上、头上乱捣乱抽；有的还用水龙头向请愿队伍喷射。一霎时，有五六十名男女学生受了重伤，受轻伤和被冷水浇病了的是更是不计其数，造成了天津一次最大的流血惨案。消息传出后，全国各地对反动当局倍加愤慨，斗争浪潮更加猛烈。

郭隆真等人被带到反动政府的营务处，一周后，又被送到警察厅拘留所。她们知道周恩来等20多位代表就关在近处，但不能会见。大家坚贞不屈，先后进行了反锁门和绝食斗争，逼得反动当局不得不同意男女同学自由往来。于是，他们在狱中组织游艺活动，还坚持学习英语、数学、历史等，互相帮助，亲如手足。

4月5日，各界联合会组织了24人到警察厅，要求替换被捕的

24名代表坐牢。这一要求虽未实现，但终于争得了探望被捕代表的权利。郭隆真、张若名见到了分手数月的亲密战友邓颖超等同志时非常高兴。她们互相勉励，监狱内外共同努力，密切配合，推动了全国群众运动不断发展。

两天后，郭隆真等被移送到敌检查厅。4月11日，是郭隆真的生日纪念日。这一天她病了，周恩来等同志带着男同学的深情厚谊，拿着一面镶着国旗的镜子，送给病中的郭隆真做贺礼。郭隆真手捧贺镜，感动得热泪盈眶，她不顾病情，和周恩来同志畅谈革命的宏图大志。最后她怀着激动的心情，给同志们写了一封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短信：

“蒙你们诸位祝贺我的生日，我实在感谢，一鞠躬！劳你们诸位的精神，做了个纪念品，再鞠躬！使我的精神愉快，信心更足，三鞠躬！”

6月20日端午节的下午，郭隆真、张若名两人到男同学那边，一同举行娱乐和会餐。

7月6日，敌审判庭审判，郭隆真、张若名和周恩来、于方舟同属一案，被诬为“聚众骚扰”。他们义正词严地提出反驳：各界群众选出的代表，进入省署要见省长，怎么叫“聚众”呢？在省署等候接见，又算什么“骚扰”呢？问得法官无话可说，旁听的群众拍手称快。

郭隆真和周恩来等在狱中坚持斗争了半年多。由于天津和全国人民的声援，7月中旬，他们24人全部出狱。天津学联和天津各界联合会，为欢迎被捕代表胜利归来，特地举行了盛大的慰问活动。在天津各界群众欢迎会上，周恩来同志和郭隆真等代表，胸前都佩戴了人民赠送的“为国捐躯”4个金字的纪念章和耀眼的大红绸花。



1920年1月，周恩来等在反帝爱国运动中被北洋军阀政府天津警察厅拘捕。在他们的坚决斗争和各界爱国群众的声援下，反动当局被迫于7月将他们释放。这是周恩来、郭隆真等获释后的合影

会后，一家照相馆主动给代表们免费照了相。这张照片现在还珍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，胸前戴花的郭隆真和张若名站在前面第一排。

郭隆真三次被捕，在敌人面前毫不畏惧，表现了她大无畏的革命精神，代表着觉醒起来的广大中国妇女。

周恩来与郭隆真同赴法国勤工俭学

为了寻求救国之道，郭隆真与周恩来等197人于1920年11月赴法勤工俭学。

刚到法国，困难很多，食宿、工作都没有安排好，大家有些着急，郭隆真也为此担心，但她觉得只要开步走，就不怕没路走。因之，她积极和大家研究方法，到处奔走联系。不久，他们陆续找到

了仅能糊口的工作。郭隆真和两位女同学被分配到巴黎郊区的云母加工厂做工。她的工作是开机器，终日站立，手脚不停，劳累一天，浑身酸痛。但郭隆真却没有把困难看在眼里，她自己衣着俭朴，生活清苦，经常吃的是炒洋白菜就面包，穿的是从家里带去的中国式衣裳，住的是最便宜、最简陋的房间。后来，她把节省下来的钱供给张若名去读书，不要她再做工。这种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，使同学们都很敬佩。

在法国，郭隆真亲身感受到法国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，深深体验到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和黑暗，就更加信仰马克思主义。

后来，郭隆真和张若名、蔡畅、向警予、熊季光、李志新等都在法国蒙达尼女子中学学习。该校校长沙博，是法国社会党人，比较同情勤工俭学的学生。因之，他们除学习法文外，还可以阅读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以及法国共产党人主办的《人道报》、《时报》和《平民报》等。

勤工俭学的生活是很艰苦的。为了寻求真理，找到救国救民的道路，郭隆真不畏艰苦，贪婪地学习马克思主义、列宁主义。刚开始时，她对法文还很生疏，就捧着字典，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查译。虽然阅读如此困难，但她只要找到了马克思主义、列宁主义的法文书籍，就如获至宝，认真阅读。

为了宣传真理，扩大革命影响，郭隆真和张若名每晚不顾疲劳，逐字逐句翻译《剩余价值》和《阶级斗争论》，经常工作到深夜。每译完一篇，她们就立即送给周恩来，请他审校和修改。周恩来十分支持她们的工作，认真而又及时地帮助她们审稿、定稿。郭隆真取回书稿后，马上自己动手刻钢板油印，直至装订成小册子，寄回祖国。

在天津学生爱国运动中，在旅法勤工俭学中，郭隆真与周恩来

相处多年，周恩来对郭隆真的思想和品质很熟悉，对她不怕艰险、不知疲倦、积极追求革命真理的精神经常予以赞扬。为了鼓励和帮助她更好地树立革命思想，使她尽快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，周恩来不顾工作任务繁重，常去看望她，向她介绍国内的政治形势，讲解马列主义真理，交流学习和斗争心得。

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传到法国，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受到很大鼓舞。1922年6月，周恩来、赵世炎、陈延年等同志在欧洲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组织起来，在法国组建了中国少年共产党。同年8月，经中央决定，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。

有一次，周恩来找郭隆真做了长时间的交谈。他从满清王朝到辛亥革命，从历代农民起义到“五四”运动，从十月革命到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，做了精辟的分析。这次谈话使郭隆真受到深刻的教育。她认识到：中国几千年来无数次的农民起义和爱国运动，最后都归于失败，其主要原因是缺乏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来领导。苏联十月革命之所以成功，就是因为有列宁领导的苏联共产党。要拯救中国，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起来革命。于是，她决心接受党的考验，使自己成为一名共产党员。

根据郭隆真的一贯表现和进步要求，1923年，经周恩来、尹宽介绍，她先加入了中国少年共产党，后经中共旅欧总支部决定，吸收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1924年她被党组织派去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。东方大学的学员大部分来自苏俄远东各少数民族，另一部分来自中国、朝鲜和日本，名誉校长是斯大林。校内专设“中国班”，学生百余人，学习课程有哲学、政治经济学、马列主义（即联共〈布〉党史）、东西方革命史、中国革命史、俄文等，授课的苏联老师都是用俄语讲授，再有一位翻译当场译成中文。当时，学生们的学习和生活是非常繁重和艰苦的，白天上课，晚上冒着严寒

